

中国

五四时期

ZHONGGUO WUSI SHIJI ZIYOU ZHUYI

自由主义

张胜利◎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

五四时期

ZHONGGUO WUSI SHIJI ZIYOU ZHUYI

自由主义

张胜利◎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张胜利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01-010488-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631 号

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

ZHONGGUO WUSI SHIQI ZIYOU ZHUYI

张胜利 著

责任编辑:张旭

装帧设计:徐晖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印刷: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数:220千字

书号:ISBN 978-7-01-010488-1

定价:28.00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1
一 中国自由主义脉络	1
二 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国品格	4
三 一种质疑	5
四 应有的思路	6
五 一种解读	8
 第一章 导 论	10
一 与本书相关的几个概念和本书研究的问题	10
二 本书研究的意义	17
三 国内外对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	21
四 本书研究的特色与难点	24
 第二章 严复的民族自由主义思想	26
一 民族主义的目标追求是严复引进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26
二 严复民族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冲突	29
三 严复的民族自由主义包含有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	32

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

第三章 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	35
一 中国已有的自由主义积淀是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广泛传播的学理基础	35
二 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	38
三 杜威与罗素来华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0
第四章 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	58
一 自由主义者的解释	58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63
三 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64
第五章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同人分析	67
一 《新青年》与《新潮》的同人编辑群体	68
二 五四自由主义者主要成员	70
三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同人分析	73
第六章 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	76
一 五四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76
二 五四自由主义者批判的武器	86
三 五四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90
四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对中国传统的批判	104
五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对封建宗法思想的批判	113
六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妇女观	119
七 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130
八 五四自由主义教育观	138

第七章 “问题”与“主义”之争	156
一 “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156
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经过	158
三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解读	161
第八章 五四自由主义的歧路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	167
一 五四倡导自由的同人的分化与中国思想界的重组	167
二 五四自由主义的困境	173
三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	188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199

前 言

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一 中国自由主义脉络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为此，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年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的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②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发生学，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学理介绍到中国，一开始就是一种工具，一种救国的工具。在中国，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从 19 世纪末进入国人的视野，维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9—1470 页。

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

新变法运动追求富强的工具理性目的为自由主义的输入提供了契机。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进入中国要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变法、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开始算起。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壮大的，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如议会政治、有限政府的政治理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学说、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用来与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但是，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最为缺乏的是自己阶级的有力支撑，维新变法运动中，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壮大到可以取代封建统治的程度。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识皆停留在工具理性的程度，也就是将自由主义看作中国走向富强与摆脱西方列强的手段。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力量对比一直都没有改变。

辛亥革命的始胜终败虽然使国人与资本主义制度擦身而过，也使自由主义失去了在中国成为一种制度设计的机会，可之后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在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有意避开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国人更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功利自由主义上。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考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杜威的功利自由主义情有独钟。杜威自由主义与民主观念紧密相联，在杜威那里，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是个人能力的最大发挥。与早期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相比，杜威竭力主张个人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心与参与。在五四自由主义者的眼里，这种积极有为的自由主义对当时的中国十分适合，于是，杜威的中国学生在五四时期大力介绍与传播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杜威的来华与他的学生如胡适等人在中国的名声大噪，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教育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在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正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危机日益积累并得以全面爆发的时期，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化的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全面爆发，以批判资本主义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得以发展，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风靡全球，也深刻影响着自由主义理论。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属于舶来品，但一经引入，就与世界自由主义的发展保持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影响着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等各类知识分子。几乎与胡适同时，张东荪在中国大力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胡适相比，张东荪的自由主义容纳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内容。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来自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日益突出劳资矛盾的反省，认为中国要

解决好“民生”问题，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依归。但又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财富的分配不公，而是如何发展生产，要更多的消费者成为生产者。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弊端。由此可见，张东荪的自由主义具有折中主义的性质，但总体而言还是自由主义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上追求公平，但却会限制个人自由和妨碍个性的发展，并且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因此他采取严厉拒斥的态度，向往的是英国的工党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用武力选择中国命运的时候，张东荪力图跨越国共两党的武力对立，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由于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同时又反对共产党的“过激”政策，张东荪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的市场。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据点转移到了台湾。代表人物就是雷震与殷海光。他们以《自由中国》为思想阵地，继续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压制思想自由的专制进行抨击。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西化”的政策，与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现代新儒家”产生严重的对立。6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推崇者哈耶克等的影响，殷海光等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也对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开始反省，特别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经验论和科学主义开始反省，反省的成果集中在殷海光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由于殷海光特殊的经历，他对前辈自由主义的脉络与问题结构有相当的理解，也就使他在现有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认识到，如何使自由主义得到落实，将是比单纯的阐述自由主义的理念更为艰难的工作。因此，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探讨自由主义思想所肯定的诸价值与自由主义实现的背后的伦理学背景。当然他的这一工作得益于他从金岳霖、罗素、哈耶克及波普尔那里所汲取的丰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营养。殷海光在逝世前为学生编纂的《殷海光选集》的《自序》中写道：“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段话反映了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反映了其努力的方向。

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学来看，中国自由主义是对西方自由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一种自然反应。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关注只是走马观花，

马上就转为对新自由主义的青睐。中国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印记，以后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步。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简单翻版，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反对传统著称，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传统之中，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的积淀。可以说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必然产生变形，虽然由于思想的传承，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其文化的底蕴上，中国自由主义具有中国文化的品格。

二 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国品格

在近代中国，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这一理论与现实的难题。为了推行他们所信奉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西化”或者叫“全盘反传统”的态度。在近代中国，他们的宣传如此有力，以至于人们常常将中国自由主义者与“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等量齐观，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全盘西化”与“全盘反传统”的代名词。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中国文化传统与他们广泛认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如此格格不入，要引入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攻击。可以说，从自由主义传播到中国为始，中国自由主义者就对传统抱有如此态度。在严复看来，中西文化的不同，不是外在形态的不同，而是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于是从传播西学的角度出发，他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予以拒斥，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由于五四时期对西学的狂热追求，反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达到了顶点。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文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就始终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内在的张力终于演化成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大规模论战，这种论战经久不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虽然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但由于他们是基于工具理性而看待传统，就决定了这种“全盘西化”不是对传统的连根拔起，而是主张对传统进行根本的改造。也就可以归结为胡适的“整理国故”，胡适解释为：“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

中国自由主义者引入自由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富强问题，这种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

对自由工具理性的理解，导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思想中有更多积极自由的成分，也就是自由培养出来的独立人格有利于每个人才智的充分发挥，而这又是达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在自由与个人的关系中，自由成为激励个人能力充分发挥的力量之源。对“积极自由”的追求，使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天平向平等倾斜，虽然他们不像社会主义的追求者对平等的追求那样炙热，但相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革纲领更具有同情的理解。

西方自由主义者都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提倡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造。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具有这种品格，但在实际的社会改造过程中，由于对理性的过度依赖，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某些激进主义的倾向。为此，他们把对思想文化的改造看作是其他一切社会改造的先决条件，把对社会的改造完全寄托在对思想文化的改造上。

三 一种质疑

自从自由主义进入国人的视野，自由主义就成为一种显学，对自由主义的探讨与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本来自由主义在西方就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史华慈善意地劝说过那些把西方看作“已知”这一过于自负的假设——每当谈及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人们总是把西方看作已知量。当西方对纷繁的内在含义陷入令人迷惑、嘈杂喧闹的争论时，这些含义到了非西方世界，西方俨然成为一个明确的已知量。^① 胡适在其《自由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孙中山曾说社会主义有 57 种，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② 在涉及中国自由主义时，殷海光列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六种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用白话文。^③ 他提出，当某种人物在某一阶段合于这一组性质的四种时，就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欧阳哲生认为这六个条件过于宽泛，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统一趋向自由选择。^④ 除了对自由主义以及中国自由主义的含义存在着争论以外，对近代中国自

① 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叶凤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世纪出版集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④ 参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由主义的发生学也存在争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否定近现代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当然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中国有自由主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产生和兴起于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之父，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真正的开创者。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多方面的，然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失败的原因探求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歧义，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学皆是为了说明此一问题。^①

当1949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用武力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时，实际上就宣布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中国的失败。于是，各种派别怀着各种心态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进行探讨，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了寻求自由主义的出路，也开始探求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常为学者引述的是殷海光在其《中国文化的展望》中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论，“先天不足”就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内部根基问题，“后天失调”就是其外部环境的缺失。很多学者热衷于对此进行解释。问题是假如中国没有引入自由主义过程中的这些缺失，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就可以成功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它同样会走向失败。

四 应有的思路

对于“先天不足”，人们往往采用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认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于西方，但是自由主义来到中国发生了重要变形，自由主义被视为救国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结果其内在的价值却被遮蔽，个体至上的原则被弱化，经济自由主义被忽视。此种判断本身就存在一个悖论：既然为了救国而引进了自由主义，那么救国的工具理性意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救国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就应该相得益彰。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恰恰相反。

关于“后天失调”，美国学者格里德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

^① 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的答案。”^① 许纪霖指出：“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之交臂。”^② 此种分析范式的问题就在于，它首先肯定了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肯定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完美性。好像自由主义本身应该在中国取得成功，自由主义没有取得成功是历史的遗憾。还隐含着中国1949年以后所走的道路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然而，真的如此吗？假如中国自由主义真如同他们分析的那样，是暴力与社会的动乱没有给自由主义以机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了，为什么自由主义还被冷落呢？显然他们的分析范式具有天然的缺陷。他们的分析虽然表面上看似高深莫测，实际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对自己的发现作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完整的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破天荒地提供了一条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列宁认为，“唯物史观较之以往的历史理论有两个根本的区别：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考察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④ 列宁的概括是科学的、精辟的，应成为我们考察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

② 胡伟希、田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④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6页。

五 一种解读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者独有的，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不具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①毛泽东同志在此作的分析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而言的，但同样适合作为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走向失败的原因分析。自由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这种需要，是因为没有被中国人民所认可，没有同最广大的人民产生联系。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才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巢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抵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③毛泽东的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说

① 《唯物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列宁最早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农业国”的概念，他没有详加论述，也没有把二者放在一起，但却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启示。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第一个提出“半殖民地”的概念，蔡和森第一个提出“半封建”的概念。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详细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毛泽东从十个方面揭示了帝国主义如何用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全过程，还从六个方面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点，他作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革命基本问题的科学阐述的正确结论，从而建立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

③ 《毛泽东选集》，《唯物历史观的破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明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不能帮助中国人完成“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①

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根本就缺乏对自由主义的认同，自由主义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能帮助中国人完成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失败。同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主义也不能帮助中国人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历史还将证明自由主义始终在中国不会成为一种主流思想，梦想自由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只能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相情愿。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 637 页。

第一章 导 论

一 与本书相关的几个概念和本书研究的问题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为了研究的方便，有必要弄清与本书相关的几个概念及问题本身，它们是：自由主义、五四运动、中国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

（一）与本书相关的几个概念

1. 自由主义

应该承认，只有非历史的概念才能赋予其恰当的定义，而涉及社会政治哲学时，没有什么概念是没有歧义的，自由主义是最充满歧义的概念之一，对自由主义给以恰当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①我们在此只是简要回顾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古希腊、罗马及欧洲中世纪的社会都存在着自由主义的种子，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则是近代的产物。开启自由主义思想的是文艺复兴与新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两个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按照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观点，西方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

^① 关于自由主义充满歧义的原因，李强在其《自由主义》一书中分析有三点：一是自由主义的历史性，也就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发展过程中强调的重点不同，也就使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涵义；二是研究者的不同带来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同，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强调其不同的方面，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不同的自由主义画面；三是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运动或政党的旗帜。

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把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①自由主义在西方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把人作为目的，作为万物的尺度，突出强调人的幸福、尊严与意志，而文艺复兴开启了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比文艺复兴稍晚的新教改革对自由主义的兴起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新教改革开启了人神直接的对话，人不需要借助于教会就能与上帝相联系，表面上提高了神的地位，实际上提高了人的地位。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揭示了只有新教伦理才能结出现代自由主义的文明之果，才能孕育出个人自由与个人主义。后来，随着新教改革的日益向前发展，又孕育出了宗教的宽容精神。这里我们很明显地发现，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完全是人价值理性的产物。在古典自由主义大师那里也无一例外地论述人的价值的优先性，特别是洛克论述了自由主义的两大基石，即个人自然权利理论与有限政府理论。人具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也就是生命、自由与财产权不可转让与侵犯，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这里我们发现自由主义者把个人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国家的目的在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特别是它倡导的自由经济理念带来的贫富分化、劳动工时、卫生条件、安全条件，等等一系列问题。自由主义开始由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积极自由的理念。格林的积极自由理念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自由不但是缺乏外在的限制这个消极的概念，而是一个去实现某种目标、去做某种事情的实际的权利与能力；格林的自由概念里还具有某些道德的因素，自由并不意味着去做自己希望做的事，而是做那些有意义的、值得做的事；格林的自由概念中还包含着平等主义的概念，在自由面前人人平等，自由不是某些人的特权，而是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格林将自由的概念与权利、能力的概念相联系。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但无论自由主义如何变化，自由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并没有改变，无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依然坚持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个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个人的自由。

①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